



2021年6月,贾平凹在自己70岁之际推出全新散文集《人生从容》,该书由贾平凹亲绘封面,三次甄选亲定49篇篇目。他在书里分享自己从容乐观的人生观,告诫年轻人在任何年龄段都要奋斗,不要躺平,积极面对各种困境。日前,贾平凹接受专访,谈及新作及日常生活——

贾平凹

### 我可能成名了 但成名不等于成功

胡杨



贾平凹

#### 人生没法改变 能改变的是面对它的态度

胡杨:怎么理解《人生从容》这个书名,想传达怎样的人生观?

贾平凹: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实际上对一个人来讲,他各个生命阶段完成各个生命阶段的事情,比如说小时候就好好玩,当学生就好好读书,工作以后就把工作做好,到老年以后就过好老年生活,每个阶段都是从容的。但是从整个人生来看,有句话是这么讲的:不管坏事、挫折或者是好事情,尤其不好的事情到来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而能改变的是你面对它的态度,有了这个态度以后对于突然而来的灾难,就知道应该怎么去对付。这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从容”。

胡杨:您觉得人生从容是不是和年龄有关?

贾平凹:是的,这个从容从局部来讲,年龄大了,经的事情多了,他越来越从容了。但我讲的从容是从另一个角度,就是漫长的人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事情,这是不可抗拒的,也没法改变的,所以只有在接受它的过程中形成这种心态,比较从容的一种心态,有了这种心态以后,会有另一种积极的解决方法。

胡杨:您说挺喜欢写散文,感觉散文更自在一些,为什么?

贾平凹:散文一方面它篇幅短,不像长篇需要熬几年的时间。从具体情况来讲,这十几年都是在集中精力地写长篇,散文相对来说写得少了。散文写得最多是我30多岁的时候,明显的,年轻时候的创作和后边的创作还是不一样的,年轻的时候有激情,对什么事情都感到好奇,见什么就想写什么,追求那种很清新的东西,很优美的东西成分多一些。到年纪大了之后,零星地写些散文,那都是自己生活中,人生几十年里面体悟到的东西,真正自己感受到的东西,把它写出来。这个时候写的东西就没有章法,没有起承转合,没有开头结尾这种讲究技巧的东西更少了,更多的是自己的体会。它和年轻的时候比起来,感觉激情可能少了,感觉恐怕也不灵敏了,句子也不是很优美了,但它更多的是自己体会来的人生智慧。

#### “35岁的人” 如何才能不焦虑?

胡杨:现在流行的短视频直播、带货等,有些作家用这种方式 and 年轻人交流,您关注过吗?

贾平凹:我知道这个情况,但我要补充一点,文学创作毕竟是个长远的东西,比如说出版方面为销售你可以这样那样,但总的来讲文学还是实实在在的,有时也不能太迎合一些时尚的东西,作为一个作家来讲,还是要踏踏实实把自己作品做好,如果只是迎合一些时尚的东西,我估计都是不可能长久。

胡杨:网上有人说,过了35岁找工作就特别难,而且特别容易被社会淘汰,站在您的角度来看,他们是不是在贩卖焦虑?如果是,您对于过了35岁的人有什么建议?

贾平凹:我自己是年龄大了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像我这种上个世纪50年代的人,大学毕业以后自然有很好的工作干,但那个时候的工作没有挑剔,把你分到哪就是哪。但现在的年轻人,我接触的周围的年轻人特别焦虑,遇到的问题特别多,面临房子的问题、车子的问题、婚姻的问题,这生存的压力比我当年要多得多。至于说35岁寻不着工作这方面情况我了解得不是很多,我觉得作为人来讲,一生都在奋斗,要相信自己,天生我才必有用,要保持这个信念,这个态度,任何事情就不显得那么焦虑了,焦虑对应的词就是从容嘛。

#### 突然发现自己写的东西不行 改变又来不及了

胡杨:《人生从容》这本书里很多文章时间跨度比较大,有50年前的。现在您再回头看当年的文章有什么感觉?

贾平凹:我年轻读书的时候,喜欢一边读书一边拿个笔记本,有很多幽默的句子可以把它摘出来,或者有什么想法、体会都把它写出来。年轻时候的作品里面能摘录一些幽默的句子,到老了之后,不讲究这些东西,完全变成一种说话的东西,自己体会的东西多了,年轻时生命体会的东西少一些,都是受别人的启发,受什么触动,发一些感慨。也有一些无病呻吟的东西,年轻时自己说愁的这些东西。但老了自己说愁,说苦是用另一种形式,另一种语调把它写出来。

张幼兰:1949年后,高剑父就离开大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高师。他的学生关山月、黎雄才、方人定、黎葛民等传人坚持关注现实、反映时代、海纳兼容的艺术主张,将岭南画派发扬光大。他们从关注民间疾苦转到讴歌新生活、新时代,创作了不少独树一帜的传世之作。今天的岭南画派可以说是百花齐放、百舸争流。

# 高剑父开创“新国画”道路的当下意义

□陈天

高剑父一直被称为岭南画派的创始人,在他去世70周年之际,探讨由他始创的“新国画”创作技法及观念对当下美术创作的启示,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高剑父

## A “新国画”的核心要义

经常有人问我,广东近现代美术史上谁可以称得上艺术大师?我自然而然就想到高剑父。他无论在艺术观念上和艺术实践上都有大的突破,其倡导的“新国画”脱离了古代艺术对完美世界的设想,转向对历史与现实的观照。

融合中西、贯通古今,今天说起来好像是平常的事情,其实要回到高剑父那个年代的语境才能体会到他的才华与勇气。作为岭南画派的创始人,高剑父处于中国现代性转型发生的起始期,因其艺术实践而形成的岭南画派带有明显的现代性意味,而这种意味背后更关联着当前中国艺术的路径选择问题。

岭南画派的创作是一种“新国画”,它以中国画这一传统艺术的现代表达为核心。作为中国画的创新流

派,其鲜明特征即时代性。在高剑父看来,绘画与时代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艺术表征是一种后起的、静态的社会反映,因此,他认为,“绘画要代表时代,应随时代来进展,否则就会被时代淘汰了”;但不要切近现实,要在“现在之人间世”,还要对未来有所寄望。

高剑父的艺术实践在两个层面上具有现实主义的特征:在绘画的题材和内容上,高剑父的作品具有极强的现代生活表现力——中国画出现公路、轮船、飞机、汽车和收音机,在高剑父以前从未有过;现代人物,特别是劳动人物入画;更重要的是,还和中国所处的危亡语境密切相关。九一八事变之后,他画的《悲秋图》,以及其后的《白骨犹深国难悲》《埃及英雄》《灯蛾扑火》《弱肉强食》等题材,都有着强烈的现实批判意义。“无论学哪个时代之



游鱼戏花影(国画) 高剑父

画,总要归纳到现代来。”这是高剑父“新国画”艺术实践的核心要义,它为后来整个岭南画派的形成与传播奠定了基础。

## B 创作技法的“中体西用”

岭南画派的创新是建立在对现实的高度重视和关切基础上的。但关注现实并不意味着写实,用诗意的中国画理念去表现现实,这种“创新”构成了岭南画派艺术实践的重要传承,也是对中国画既定传统的一种反叛。长期以来,中国画传统形成了严重的“笔墨程式”,而岭南画派对此所进行的“革命”,除了具有融入时代观察生活,更重要的是个人意识的介入,即对所观察到的现实进行艺术想象的加工。

高剑父主张的时代性与大众化都要求其艺术创作与实践“写真”,但其“写真”又不是“笔墨程式”化地进行,而是高度重视与前人的不同。这种不同多是“自家体贴出来”,需要学生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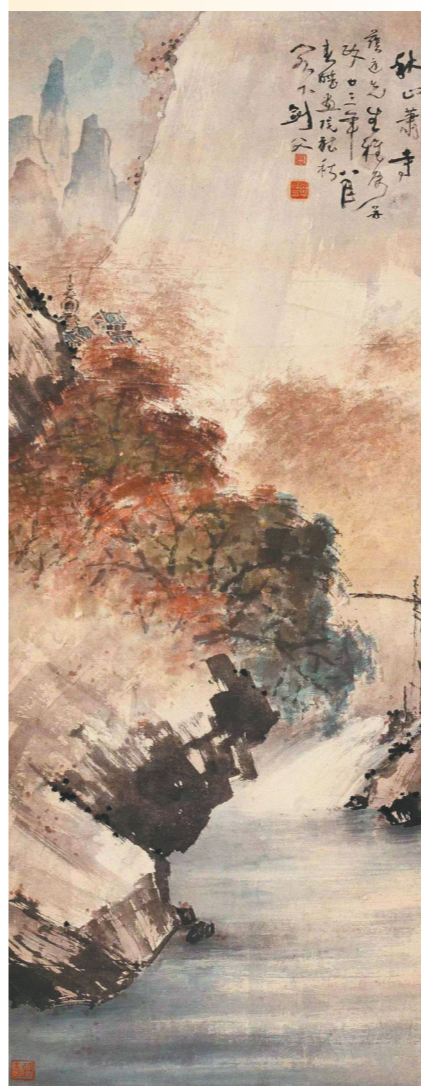
认真观察、认真听讲、认真学习,又有个人独到的见解、路径和成就。

高剑父早年留学日本,后来又游历南亚各国,对欧洲绘画也有过深入的研究。这些求学与游学经历,为其绘画的创作与教学提供了极为广阔的视野。而这种视野很快就成为其“新国画”学习一种具体方法,即折衷中西,实现中西美术的杂糅。

高剑父弟子叶绿野回忆:“高师对我们的课程安排,有素描、色彩学、诗词、书法、美术史,还有艺术观赏会。他主张学中国画也要学西画写实的基本功。素描用以解决造型能力,还要临摹水彩画,用中国画临摹油画……他主张写生,去破除那种七拼八凑的笔

墨程式,这在当时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改革。”将不同类型的艺术(国画与油画)进行相互整合,既显现出以国画为本,以西方油画为参照的创作立场,又显现出借鉴油画处理手法来改进国画的创作取向。大体来说,这是一种创作技法上的“中体西用”。

创新出自杂糅,唯有从多种艺术形态的混合状态中,才可能产生新的艺术形态,尤其是产生不同情感交融的混合体。而高剑父倡导的“新国画”正是从中西方两种绘画文化、美学思想的混融中而产生的中国新美术流派。如其自言,“作画不一定用笔、墨、色、纸、绢……我曾用布、海棉、报纸、牙签、声根写之……至今播为艺林佳话”,便是杂糅式的创新。



秋山萧寺(国画) 高剑父

## C 关山月:高剑父没使用过“岭南画派”这一名称

“岭南画派”的命名带有明显的地域性意味,虽然这一命名并未得到高剑父的认可。据关山月说,“剑父先生从未使用过‘岭南派’这一名称,而宁可自称是‘折衷派’”,但“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接受‘岭南派’这个名称”,其背后必然暗含着从政治性关联来追认地域性艺术流派的隐喻。

高剑父认为,无论是折衷派、新派、洋派、日派,都不如“新国画”(或称“现代画”)更适合于对岭南地区美术

创作流派的概括。1908年,高剑父从日本归来,在广州开设的第一次个人画展,就以“新国画”命名。这一命名足以体现岭南画派以“国”为本,以“新”为表的价值立场。

不过,无论如何命名,作为一种方向,岭南画派所开创的新的美术道路已为艺术教育界所接受。如潘公凯任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主任时就提出“两端深入”的教学改革方法,即“以中国传统为一极,以西方

现代为一极,中间留出广阔的混融区域,构成橄榄形的中西绘画‘互补格局’”。然而,今天再议的开创和技术的探索,艺术已不再只注重于技术层面的探索,我们三千年的文化传统在其丰富性和与西洋文化传统的差异中,是否能从个体的立场出发为世界美术提供更独特的认识模式和审美趣味,可视为对高剑父艺术理念的一种改进,一种更适合于当下的艺术实践。

她是著名画家高剑父的女弟子、已故著名雕塑家潘鹤的夫人,近日,年近九旬的张幼兰接受专访,谈起当年跟随高师的学画生涯——

# 高剑父说她“画得不错,有前途”

□文/图 赵旭虹

“如果没有高剑父当年的接纳和岭南画派艺术思想的启蒙,我的艺术人生就不会开始……”已故著名雕塑家潘鹤的夫人、年近九旬的张幼兰声音低沉、缓慢地对记者说,双眸闪烁着亮光。

1948年,张幼兰进入由高剑父担任校长的南中美术学院,从低年级开始学习中国画。岭南画派所提倡的关注现实、反映时代、折衷中西的艺术主张,从此深刻地影响着张幼兰以后的艺术创作。

赵旭虹:是怎样的机缘让您成为高剑父为数不多的女学生?

张幼兰:我九岁开始失明,饱受耳疾带来的不便和痛苦。但我喜欢阅读和写作。从少年时期开始,只要一有空,我就爱往图书馆里跑,在那里阅读了大量中外名著,也读了不少进步文学。我还喜欢写作,十岁时就在《新儿童》半月刊上发表了自已的第一篇散文《莲塘》和第一首诗歌《我有母亲》。我也喜欢画画,妈妈想起早年高剑父曾经租过我们家的房子,于是就鼓励我给高剑父写信,大胆表达我的拜师学画愿望。

赵旭虹:结果怎样呢?

张幼兰:信寄出去后,我忐忑不安。过了一周,竟然收到了高剑父的回信,让我兴奋不已。1948年10月,15岁的我进入了南中美术学院低年级班学习,受业于高剑父、叶永青、关山月、黎雄才、方人定、黎葛民等诸位名师,逐步接受岭南画派新思想新画法的启蒙。

赵旭虹:当时的课程是怎样安排的?张幼兰:我们低年级班的10多位同学,年龄参差不齐,从十多岁到三十多岁都有。在南中学习时,高年级有一位女同学,但不久便不见了,此后全校除我之外,没有女同学。同学里就有后来很出名的叶绿野。刚进去的时候,杨之光还是高年级的学长,没多久他就离开学校了。当时,我们班的课程主要是叶永青负责教临摹课,黎雄才教山水。南中的老师都是活的课本,关山月很健谈,一开口势如悬河。他告诉我们,收集人物画材的方法,就是要多到街上画速写。还批评我们的观察不够深刻。

赵旭虹:有文化课、书法课吗?需不需要学素描?张幼兰:我们低年级班还是以临摹叶永青老师的写生画稿为主。高年级有没有文化课和书法课我就不清楚。没有素描课,学国画不用学素描。

赵旭虹:高剑父当时是怎样的一种形象?张幼兰:我们学生的作品汇报展,高剑父都来参加,还逐一点评。记得当时,他穿着浅色的旧西装,面容显得苍老。但对学生的态度,像一位慈祥的父亲。印象最深的是,他在我的画前停下来,捏着下巴微笑着对我说:“画得不错,有前途。”

赵旭虹:高剑父有哪些教导让您难忘?张幼兰:印象最深的是1949年1月在学校举行的寒假联谊会,高师用温和而恳切的语气告诫我们:一个艺术工作者,时光宝贵。尤其是寒假,要多出外写生。一,多亲近自然,多写寒山山水,因为“木落见山骨”。二,多走上街头,多写有血有肉的人物。他说:“我们作人物画,不要去赞美那些朱门貂蝉的纨绔子弟的华丽富贵,我们写作的对象,就是要到贫民窟去找寻,去精确地描绘那些面黄肌瘦的贫苦大众,或到流浪队伍里去体察,去摹写那些可歌可泣的受难者……”

赵旭虹:高剑父所倡导的岭南画派的革新精神对您有怎样的影响?张幼兰:我曾经很不喜欢国画。在我看来,国家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而传统国画却一味摹古,缺乏生气。但是,当我看到高剑父创作的新国画,就十分喜欢和仰慕。因为新国画有强烈的社会关怀意识,能反映民间疾苦,鼓舞人民斗志,而且形象生动、栩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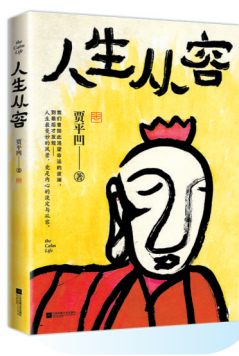
如生。我还暗下决心,像高师所说的,要努力“做艺坛上的新兵”。

1954年,我成为第一批广东省美协会会员,1982年加入中国美协,有作品先后入选广东省美展、全国美展,并获奖。如果没有高剑父当年的接纳和岭南画派艺术思想的启蒙,我的艺术人生就不会开始,更不会取得这些成绩。



张幼兰

张幼兰:1949年后,高剑父就离开大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高师。他的学生关山月、黎雄才、方人定、黎葛民等传人坚持关注现实、反映时代、海纳兼容的艺术主张,将岭南画派发扬光大。他们从关注民间疾苦转到讴歌新生活、新时代,创作了不少独树一帜的传世之作。今天的岭南画派可以说是百花齐放、百舸争流。



人生从容